

李文
著

读书 治学 阅世

DU SHU · ZHI XUE · YUE SHI

社会
热点

我们应该怎样做学术

倾斜天平上的中国学术

《三枪》：引领工具理性大行其道 心中有一轮明月

《读书·治学·阅世》作者李文倾力推荐

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

知识产权出版社

读书 · 治学 · 阅世

李 文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人类有多少渴求与冲动,世上就有多少神秘与未知。《读书·治学·阅世》是作者多年撰写和发表的学术随笔的结集。书中有作者对学术界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著作的看法,也有作者对一些政治时事、社会热点的解析与评论。读书开阔视野,治学陶冶心智,阅世躬行实践,为着洞悉与了悟,作者悉心审视古今人物直面尘世沧桑的体验和记录,静心体会人间万象蕴蓄的生死、明灭与荣枯,并注意在分析和阐述过程中贯穿“学理”,给出“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然”的诠释。

责任编辑:王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治学·阅世/李文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247-990-6

I. ①读…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研究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2825号

读书·治学·阅世

李文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om>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93

责任编辑:010-82000860 转 8129

责任编辑邮箱:wanghui830811@163.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625

版 次:2010年0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0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00千字

定 价:22.00元

ISBN 978-7-80247-990-6/C·101(292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李文研究员一个多月前打电话来，希望我为他的文集写一篇序言。和李文做同事，想来有六年左右的时间。虽说我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使用的方法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读书，而且相对来说书读得都有些杂。我先后去过李文家两次，即使是在搬入现在更为宽敞的住宅之前，他的那两间书房中被塞得满满的书架，那些书架上人文社科几乎无所不包的书籍，外加向来客展示藏书时他语气中带有的些许满足感，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为什么要读书？和许多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谁。据我猜测，李文的回答大致会是这样的：因为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书带来的乐趣相对于其他人生享受而言更丰厚更持久些；如果再进一步追问的话，那便是强烈的好奇心和与人分享知识或思想之愿望使然。这其中责任也还是有的，毕竟，读书人都必须为其丰衣足食而又不必辛劳织耕给出正当理由。

说到读书人的责任，治学首当其冲。任由兴趣指引的阅读酣畅淋漓，但对国家对社会对同行对朋友对学生也需要有个交代。在我的同事中，李文是相当勤奋的一位。每次他把新出版的专著拿来让我“批评指正”时，我感到的首先是惊讶，接下来才是羡慕和压力。由于专业不同，对其著作进行评论超出了我的能力，不过阅读李文的著述总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他的旁征博

引。在许多时候，人的品味、格调、心胸和视野，主要体现于他所偏爱的对象。

李文的这部谈读书与治学的文集，主要是写给我这样的非社会学专业人士看的。尽管对其中的有些观点有所保留，对有些倾向也不完全认同，但我阅读时仍旧兴致盎然。对思想差异本身和差异产生原因的思索，通常是阅读乐趣的一个重要源泉。虽说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然而从本文集的字里行间中，我还是捕捉到不少新的人生感悟，回忆起某些早已被淡忘的人生细节。这也恰是读书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功能：借他人之阅世感受，丰富自身之短暂人生。

是为序。

张宇燕

2010年6月

目 录

第一辑 云深不知处.....	1
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	3
历史、统计和理论.....	6
学问本是寻常事	9
我们应该怎样做学术	13
切莫随人说短长	16
切不可轻言填补空白	19
读史早知今日事	22
意见，请接受理性的检验	25
读书三喻 书读三境	28
多写是个硬道理	32
作家与买家	37
倾斜天平上的中国学术	40
第二辑 人弘道 道弘人	43
仰山铸铜，煮海为盐	45
大气英气才气和正气	50
学术圈里的刺猬与狐狸	53
徜徉于山水之间	56
三个故事见证一段历史	63
今后再难有这样的学者了	66
天赋、机遇与勤奋	69
中国的知识阶层	72

文化影响力：反思与展望	79
第三辑 亚洲：圣与俗的感悟	83
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与实践	85
印度，这片土地依旧神奇	89
在新加坡体验意外	94
神话再编中的弑父情结	97
青藏铁路：和平纽带	99
亚洲：深藏自身的文化渐成巨大能源	102
东亚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	104
21 世纪汉语的昌盛与东亚文明的复兴	116
第四辑 尽日凭栏楼上望	129
《三枪》引领工具理性大行其道	131
《大长今》热播的文化视角	135
易中天为什么这样红？	140
小沈阳现象折射大众文化饥渴	143
心仪“黄世仁”凸显社会价值扭曲	147
嫁给富二代的梦与真	151
那些事，一说便俗	155
“小跑着的狗”的确可爱	158
歪嘴和尚会念经	161
一花一世界	163
哪国护照哪国心	165
元帅与士兵	167
面对选择，你别无选择	169
第五辑 挂云帆 济书海	173
回到马克思：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175
回到马克思：人·自然·社会	18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评介	195

东方人的现代化理论·····	198
书生有用：明清实学思潮回顾·····	204
中国文化，中国精神·····	211
战争、女性与日本军国主义·····	219
数字的“妙用”·····	228
后 记·····	232



讀書 | 治學 | 閱世

第一輯 云深不知處

好的政治家，应该富有远见

近日，国家将2009年度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数学家谷超豪教授和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教授。这样的消息，令人振奋。在现代社会，如果知识生产得不到政府的倡导、鼓励和支持，实难成就伟大和持久的事业。给予优秀科学家和艺术家以精神荣誉和物质奖励，是政府介入知识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知识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又构成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精神寄托；创新是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证明，也是他们的使命。中江兆民说过，知识分子既然“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以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我也认同冯友兰给出的有关知识人使命的界定：“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来传递这团真火。”

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始终以“创新至上”为根本原则。科学史家贝尔纳曾将科学观区分为理想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前者认为科学仅与发现真理和关照真理有关，后者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理论与对策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轻孰重的争论。其实，社会科学大可参照自然科学，树立“无论什么研究，有创新就是好研究”的理念。孙家栋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但他依旧能够获奖，原因就在于他与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紧密相连，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2000年获奖的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获奖的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他们的贡献，改变了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是前无古

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模式和经验可循。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的任何新理论、新观点，以及能够使现实问题获得有效解决的新方法，都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政府有必要对创造性的劳动予以扶植和奖励，系因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现、发明，以及所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无不呕心沥血，甚至是用生命完成的。陈景润为证明“ $1+2$ ”，草稿装了几麻袋。唐朝诗人李贺年轻时刻苦吟诗，他的母亲说：“是儿将呕出心肝来。”海明威说，他的《战地春梦》第一章改了五十几次。王尔德说，他花了整个上午去校对他的一首诗，把一个逗号删掉了；到了下午，他又把逗号放回去了。这样的付出，市场不会补偿，金钱难以补偿；其本身理应获得的声望和荣誉，也超出了以商品化、批量化和通俗化为基本取向的市场的能力。

谷超豪说，数学研究“能解决复杂问题是件高兴的事情，不会寂寞。”与面向市场的精神产品必须符合笼统化和简单化不同，细化和复杂化是具有原创性学者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复杂工作的价值需要少数专家和同行来评判。我很赞同王志新院士的说法：学者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是宣传自己、树立自己学术威信，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唯一途径和最佳方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学术界和艺术界保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而具有公立性和公共性的政府成为主要出资方，则是知识阶层独立自主性的最有力的保证。目前我国学界存在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学者热衷于宣传和炒作，媒体曝光的频率似乎成为衡量学者成就的主要标准。市场化的影响日渐深入，舆论甚至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简单化的趋势。

以复杂工作为己任的学者和艺术家，多生不逢时，有些像余秋雨所说，“越是超越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马克思在许多学科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长期生

活在贫苦交加之中。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家境已十分衰败，“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近年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政府越来越注重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出现向市场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能够给国家、甚至全人类带来长久福祉的成果和作品，应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注。

然而，古往今来，怎么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受欢迎的程度大相径庭。王跃文撰文指出，邹衍和孟子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受欢迎的程度却大相径庭。能够对诸侯谋取眼前利益的邹衍最为风光。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而孟子立足根本和长远，讲仁义之道，为万世开太平，却倍受冷落。如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据此，王跃文得出结论：“现实总是势利的，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好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富有远见，不要学梁惠王，目光浅薄，厚待邹衍而冷遇孟子。

历史、统计和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统计次之，理论再次之。我不大熟悉经济学，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到张宇燕教授讲述熊彼特这番高论，大受启发，并由此联想起《新唐书·裴行俭传》中所说的“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深感“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历史”虽然不等同于“器识”，但一个人的器量和见识确与他的史学修养有关；“统计和理论”不等同于“文艺”，但从“解释的工具或手段”方面理解，确又与“文艺”二字所包含的“学理与技巧”相通。熊彼特说：“当前经济研究工作中所以出现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缺乏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大体上等于史学家所说的“史识”，而“史识”的涵义，就与“器识”十分接近了。宋代学者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贺麟在对清华老校歌中“器识为先，文艺其从”一句做诠释时也说：“现在的青年大都目光如豆，喜凭一才一艺天生的鬼聪明，来出小小的风头，绝未作丝毫涵养器识的功夫。”类似说法，均可与熊彼特的思想彼此呼应。

龚自珍有句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读史早知今日事”。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政局，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答曰：“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是按这个规律的。”历史对学术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故历史学素有“社会科学的数学”之称。现代学术重视

数理化和定量化，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坚信，没有数学形式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系统的，也是不明晰的。只有了解历史，关切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非重复性和复杂性，数学工具这块好钢才能用到刀刃上。而如果缺乏历史洞见，单纯强调统计方法和资料，极容易割断某种社会现象与其本身发生发展之间的血肉联系，忽视这一现象和其他诸多现象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验主义错误。清代学者陈澹然就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某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凡具有重大影响，能够启迪人的智力，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看待生活方式的鸿篇巨制，多是学者在把握社会发展大势和坚持政治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再出色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熟练地使用数学工具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结果。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当年日本为侵略中国，曾做过充分准备。许多日本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他们在中国完成了非常细密的调研工作，甚至对一个个村镇的资源、交通情形、桥梁和住宅等，都调查的一清二楚。但由于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气节缺乏了解和尊重，侵略战争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

通过研究，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概括出的理论，确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事物的理解，明辨是非；但如固执地认为“没有正确理论指导，就没有正确行动”，甚至以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出和创建理论，窃以为，就有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人类社会在采集狩猎阶段，几乎没有理论可言，但人类并没有因此停止前进的脚步。有些人，喜欢援引列宁的说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我总觉得，在这里，列宁是把“理论”当做某种信看待的。

理论多落后于实际，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不同社会的发展，各有其特点，现代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任何理论都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否则就会张冠李戴，削

足适履，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即使是好的理论，也只能为行动提供些参考意见，本身代表不了实践。故萧乾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吃过迷信理论的亏。中央苏区时期，由于过于看重理论，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导致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列理论词句的王明、博古等人占据领导地位，中共唯一“共产国际路线”是从，毛泽东屡受排挤和打击。据陈晋撰写的《读毛泽东札记》一书记载，中央初到延安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要不是毛主席咬紧牙关在延安窑洞里奋斗多日写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提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照搬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遭受挫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有知识精英向往西方世界，更有人力图用西方的“平等、自由、民主”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多亏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才没有听从“自由女神”的召唤，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走上自我矮化和毁灭的道路。即使目前的中国，依旧在摸着石头过河，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情况并可对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的理论，还有赖本土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学问本是寻常事

由素心人商量培养

做学问或搞学术研究的无非是通过提出并解决问题增进知识。研究工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既不神秘、深奥，也不神圣、伟大，只是平常人从事的一桩平常事，是千百行当中的一行，是一项枯燥乏味，需要踏踏实实、付出艰辛努力的工作。亚里士多德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李零说：“学术并不是一个只有强者才配参加比本事显能耐的竞技场所，而是一个有求知欲望的人大家共同向往的艺术殿堂。”二人所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情。”这里所说的“素心人”，我理解为就是有平常心的人。

学界是个金字塔

把学术深奥化，主要表现为抬高大人物工作的意义、贬损乃至否定小人物工作的价值，强调学术远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从事的。我的一位同学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他每次回国都要大讲特讲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如何了得，同时对国内同行的工作嗤之以鼻，声称若以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水准衡量，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过是一堆垃圾。张五常也持有类似观点，发表宏论说：“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上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解，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 99% 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